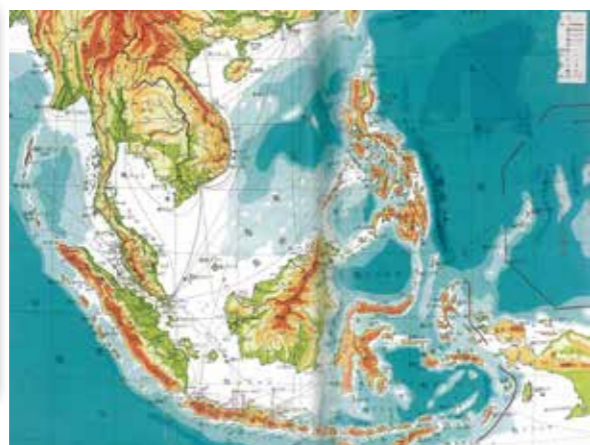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的南方調查事業

文／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大東亞共榮圈—南方大觀：附世界新秩序建設戰》書名頁。



▲南洋地方全圖（1926）。（圖片提供／曾令毅）

部分來考量的想法迥異，但是都反映總督府將「南支南洋」視為一體的想法。

1935年，在南進成為日本國策之際，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為宣傳臺灣在日本帝國南進地位上舉足輕重而出版《臺灣と南支南洋》，其中明確的

將地理範圍作了如下的界定，即「南支」包括福州、廈門、汕頭、廣東等日本帝國領事館所轄的區域，亦即福建、廣東、廣西以及香港、澳門；「南洋」則是以馬來群島為中心，包括菲律賓、英屬婆羅洲（今婆羅洲北部馬來西亞聯邦所屬）、荷屬東印度（今印尼）、葡屬帝汶（帝汶），以及構成亞洲大陸南端的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柬埔寨、寮國）、暹羅（泰國）、英屬馬來（包括今馬來西亞、新加坡）。

與二戰期間日本帝國侵略所及的「大東亞共榮圈」相較，總督府所界定的「南洋」，明顯的忽略了二戰時期的激戰之地——緬甸與新幾內亞，而這也正顯示了總督府對外發展的主要區域。「南支南洋」雖被視為一體，不過總督府的「南支政策」及「南洋政策」的基本構想相異，「南支」的主要對象是臺灣人，對岸工作的實

甲午戰爭後，日本之所以要求領有臺灣，主要著眼點是為取得向南發展的踏腳石、跳板；而日治時期的「南進」，也始終是臺灣總督府對外關係的主軸，這個主軸可以簡稱為「南支南洋政策」。

「南支南洋政策」下的地理範圍

臺灣總督府對外關係中，「南支南洋」所指涉的範圍是流動的。「南支南洋」的地理概念，含括地域因總督府的想法而擴張或縮小，顯示了總督府的對外關心。如「南支」的範圍，曾因戰略地位的考量而包括雲南、法屬印度支那地區；「南洋」範圍也曾包括德屬的南太平洋諸島，但是實際上「南支南洋政策」的施行範圍卻遠不及此。兒玉源太郎總督時期（1898-1906）將「南洋」視為「南清」的一部分來考量的想法，與田健治郎總督時期（1919-1923）將現在的東南亞、南太平洋諸島，以及華南一帶都當作南洋的一

權掌握在警務局，首要目的是控制臺人，對岸事務可以說是臺灣島內警察統治的延長。至於「南洋政策」，總督府能夠發揮的空間並不多，主要是補助與臺灣沒有直接關係的日本人企業。

總督府的調查方法： 領事報告、官員視察與調查課

總督府既然以「南支南洋政策」作為對外發展主軸，如何迅速掌握正確資訊，累積當地的知識，成為重要課題。整體而言，主要的方式是：

1. 藉由對岸領事與事務囑託以獲得情報：包括讓領事兼任總督府囑託、事務官，或者召開「對岸領事協調會」，以獲取必要情報。或者派遣駐在員、警察等到領事館，以協助領事館調查與警察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對岸駐在員是澤村繁太郎。

2. 派遣官員實地調查。統治初期，總督府即以「殖民統治」參考之需為名，派遣人員前往海外調查，著名者如愛久澤直哉，受命調查鴉片原料來源與供需狀況、南洋各地殖民政府的鴉片統制政策等。返臺後，他頻繁的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對於南洋之觀察。類似愛久澤般，到海外視察後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視察報告的情形不少，在交通阻絕的時代，《臺灣日日新報》上的相關報導儼然成為重要的南方知識泉源。愛久澤直哉更因為南方調查而結識有力華僑，從而在總督府的後援下設立「三五公司」，代行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並成為最早在馬來半島南端的柔佛地區大規模栽植橡膠園的日本企業，成就其個人傳奇。

愛久澤的調查報告書被收入後藤新平民政長官（1898-1906）的個人文書，其他

類似的調查報告上繳後有被編入總督府檔案者，但尚未公開出版。1913年，總督府將松岡正男的《南洋諸島視察復命書》，作為「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第一號出版。松岡正男是著名的殖民政策論者，非總督府官員，在總督府的經費補助下進行調查。本書內容包括砂勞越國的一般狀況、對南洋的貿易、菲律賓之現勢與美國對菲律賓的殖民政策、新嘉坡為中心的南洋海上交通等。

對於總督府所展開的海外調查事業，日本中央並不以為然，認為總督府應該專心於島內統治，而外務省更以總督府的獨斷獨行為戒，事事牽制。不過，總督府仍舊堅持行事。據說民政長官下村宏（1915-1921）便以自身進退為賭注，要求日本首相寺內正毅允許技術人員以外的官僚也得以至海外進行調查。於是，片山秀太郎、鎌田正威、阿部滂、加福豐治、梅谷光貞、水越幸一、阿部嘉七等，便紛紛前往「南支南洋」調查。他們歸國後，或者舉辦演講會，或者將見聞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上；總督府也將其中部分報告編入「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系列刊行，一時之間引起「南支南洋」熱。



▲1918年《南洋調查復命書》封面及序。

「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系列一直發行到1939年，共計240號（另有別卷3卷）。以調查地區來看，除了總數最多的華南外，南洋地區最多的是跨地域的南方一般的調查（47種）。以國別言，則以資源豐富的荷屬東印度最多（40種），其次是菲律賓（27種），英領地區（21種）、法屬地區（10種）又其次，而大洋洲、暹羅及緬甸則僅有8種。

3. 調查課的設置。1918年6月總督府設置官房調查課，開始展開有組織的調查活動。設立之初由參事官片山秀太郎主其事，其下則有專賣局、鐵道部、財務部、地方部的官員及警察官吏兼任事務官，至於統計官、翻譯官、技師、屬、通譯等人選，則由臨時國勢調查部、外事課、殖產局、法務部的人員兼職。由這樣的人事布局來看，可知並不具備專任調查機構的形式。但因片山秀太郎（1918.6-1919.11）、鎌田正威（1919.11-1921.5）、東鄉實（1921.5-1924）等三位課長都有豐富的調查經驗，也是深具經綸「南支南洋」意識的人物，因之得以建立調查課的基礎。片山秀太郎之後轉任臺北



▲ 1918年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處務規程，第三條規定，其下之調查股的職掌為有關華南、南洋的調查。

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培植了許多基層的南方調查人員。調查課被認為成果最輝煌的時期是原口竹次郎主掌1919年-1931年間，他在招聘擅長各國語文的



▲《外事週報》第22號（左圖）、《內外情報》（右圖）第1號由《外事週報》、《統計週報》合併改刊名。

的人才、培訓基層調查人員等工作上煞費苦心。在培訓工作上，基層調查人員的例行工作是在各自擔當的區域內，以剪報、翻譯等方式，用來熟悉當地的狀況，並提供給長官參考。這些剪輯的資料，編輯成《內外情報》、《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等刊行，並儘可能讓他們接受語言訓練，藉此方式，培植了為數不少以臺北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主的調查人員。

調查課是總督府獲取「南支南洋」情報的重要來源，1921年開始的《內外情報》，乃合併過去的《外事週報》、《統計週報》而成；1925年12月以後，《內外情報》與《臺灣時報》合併，成為雜誌末尾的附錄；至1931年11月，又改名為《南支那及南洋情報》。《內外情報》收錄之記事，以量而言，絕大多數是中國相關報導，其次依序為菲律賓、蘭印和馬來，反映了總督府的關心度與彼此關係之密切程度。而關於南洋的記事數量，與「南支那及南洋調查書」系列的地區分布大致相同，也與總督府對於南洋日本人企業補助額度的多寡一致，都是以荷屬東印度、菲律賓與英屬地區為中心。

對於荷屬東印度地區，最初僅止於一般狀況報告。1920年代以後，開始對於鑛業、地質學、熱帶栽培業的橡膠、椰子、纖維、可可、砂糖等資源，以及土地法、地方行政法、租稅、關稅法規、金融、公司法、外國人的投資及政治狀況、人種問題等攸關企業投資的預備知識，也列入調查對象。隨著



▲荷屬印度東部群島語言分布圖。

日本人到荷屬東印度的增加，總督府對於當地的關心也日益升高，這可能也反映了調查課原口竹次郎的觀點，原口之後成為荷印的專家。1935年原總督官房的外事課、調查課合併，之後擴大為外事部。外事部另行出版「南方資料」系列，或許因戰爭因素，「華僑」及其原鄉華南成為調查的重要標的。而外事部之外，總督府的各部局，高等商業學校與臺北帝大等學校，以及臺灣銀行、華南銀行等金融機構，國策會社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民間團體如南洋協會、南方協會等原本也有海外調查的傳統，調查成果，整體累積成臺灣的南方認識。

日本帝國中的臺灣南方調查

臺灣的南方調查成果如何評價？或者說臺灣的南方調查在日本帝國中占有何種地位？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將小西干比古為首的「南洋經濟研究所」的出版品，拿來稍作比較。該研究所出版叢書近400號，多為小冊子，部分為與臺灣相關的書籍，例如臺銀支店長根本榮次的《臺灣銀行南方進出盛衰記》，婆羅洲水產會社社長折田一二的《ボルネオ水

産株式會社創業經營の苦心》等，這些臺灣的重要機構，或是接受總督府補助的企業的經營情形，反而未收在總督府等臺灣關係者的調查中。

若再以日本整體「東亞調查並研究團體」來看，在東京的「東亞研究所」，在大連的「滿鐵調查部」，在帛琉的「南洋廳熱帶產業研究所」等常設的官、民專責調查研究機構，以及任務編組的文部省直轄之「資源科學研究所」、朝日新聞等報社、京都大學等大學，都從事包括南方地域的廣域調查。

至於專責南方地域的，依據1942年「興林會」的統計，至少有「外務省南洋局佛印資源調查室」、「開南探險協會」、「泰室東京事務局」、「太平洋協會」、「東京帝大南方資源研究會」、「南方經濟調查會」、「南方產業調查會」、「南方植產資源調查會」、「南洋栽培協會」、「南洋經濟研究所」、「南洋拓殖株式會社企畫課」、「野村合名會社海外事業部」等設置在日本本國的機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東京支店印度支那調查室」似乎被淹沒於其中。

儘管以臺灣為據點的調查只是日本帝國龐大調查成果中的一小部分，然而，相對於日本帝國的調查，臺灣的關心與目的與日本內地自有區隔，所累積的調查成果，具有「臺灣與南洋」的特色與觀點，進而成為臺灣史上「對外關係史」中「南向」研究的重要寶庫。☞